

## 主题讨论：国家治理：本土性与多元性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国家治理不仅被执政者纳入国家转型、改革与发展的视阈，而且日益成为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研究的热门议题。就中东非洲地区而言，鉴于该地区所具有的深厚历史底蕴与丰富政治文化，其治国理政研判不应局限于西方的治理理论、模式和话语体系，而应从其本土性为切入点，深入观察多元性内在机理。

通观本期 7 篇专题论文，作者们所表达的主要观点可概括如下：其一，国家治理凸显历史性与现实性的互动。伊拉克和利比亚之所以选择“阿拉伯社会主义”国家治理模式，既与两国特有的政治文化、历史文化和社会文化息息相关，也是阿拉伯民族主义思潮的应然反映；伊朗的领袖治国模式则彰显该国深厚的伊斯兰体制历史渊源和现实延续性；考察卢旺达的民族治理，需考虑其殖民历史遗痕与当代民族政策选择。其二，制度建设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着力点。国家治理是一种政治活动和政治行为，具有阶级属性。在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的“保守民主”理念引领着该国政治改革实践；在南非，平等、民主与统一政治体制的建立是该国实现平稳民主转型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其三，国家治理能力与其经济基础、社会结构以及政治文化具有正相关性。国家治理必须符合历史发展的规律，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作为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重要反映，必然受到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也与其相伴生的社会阶层结构及政治精英所秉持的主流政治文化互为镜像。北非诸国民主转型的困境正在于此。其四，中东非洲国家在治理过程中，面临着内治与外拉的情势，其作用既有互推的一面，又有互阻的一面。由于历史和地缘政治经济原因，中东非洲地区长期是世界大国纵横捭阖的国际舞台，外部力量对国家和地区治理有很强的影响力。英、法、美等西方国家将国内的治理秩序扩张到中东非洲地区，伊拉克政权的被颠覆、卡扎菲政权的倒台、埃及军人力量重新回到国家政治中心等，都可以看到西方大国插手中东非洲国家事务的影子。与此不同，中国则通过合作性接触，适度建设性参与该地区或国家治理。调解南北苏丹冲突、叙利亚危机、伊核问题、巴以冲突等积极作为，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的重要内容。